

对于铅字的回忆，原本是尘封在记忆深处的，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位作家朋友的散文，才被钩沉了出来，原来我对铅字，竟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。那位作家的散文，写出了作品变成铅字之后，那种激动与幸福的感觉，以及读者对文学报刊的尊崇，对此我深有同感。但若再深入一层，我在一家新闻单位干过排字工种，还亲眼见到自己的一首诗歌被排成铅字发表，并且后来还做过近四十年报纸副刊编辑，这种经历不会是人人都有的吧。

从中学时期，我就喜欢上了写作并尝试投稿。那时，天津人民出版社有一本期刊叫《革命接班人》，里面有几个页码的文艺作品，是专门面向中小学生的。我曾拿着自己的习作送到编辑部，接待我的负责人，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。之后，我受电台广播小说的启发，在用废旧牛皮纸装订的草稿本上，写了一篇小说，大约有两万多字，是仿照中篇小说架构完成的，内容是写一个小学生练习体操，被体操学校录取后迅速成长，以骄人的成绩为国家争得了荣誉。再后来，我利用学工劳动的间隙，写出了几十首诗歌，用钢笔工整地抄写在雪连纸上，装订成一册手抄本诗集，起名《火红的战旗》。

这些学生时代的写作，虽然是奔着发表去的，却最终都未能转化为铅字，刊印在出版物上，不过我早就立下了心志，努力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。正是那本钢笔字抄写的诗集，给了我难得的机遇，班主任老师向到学校招工的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特别举荐了我，说他的这个学生喜欢写诗，并且有“作品”。后来，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我还为此被叫到学校作过一次特殊的面试，而之前我并不知内情。后来我接到分配通知，得知自己被分到天津日报社工作，内心是怎样一种兴奋，如果我没有那样一册“诗集”，班主任老师也不会那样有底气。

#### (一)

到天津日报社报到的日子，是一个刻印在心底的时间：1975年10月8日。我穿上的的确良绿军衣（当时的逛衣），骑着自行车来到位于鞍山道上的天津日报社行政楼，到人事处办理了相关手续，正式走进了这家市委机关报。经过一周时间的集中学习，我们这批共九名学生，被分到了除编辑部之外的不同车间。若干年之后，我才听说，负责我们入职学习的报社宣传科科长，曾拿着我的那本所谓的诗集，向其他学生表扬我的写作，还说我的钢笔字写得如何好。我当时并不知晓这些，随着其他三名新同事，迈进了我人生的一片新天地——天津日报社排字车间，对外也称“排字股”，对内叫“排字房”。

排字车间在办公楼的第二层，宽大明亮。一踏进车间，我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，我从没有进入过如此整齐划一的工作场所，满车间没有别的，都是铅字，简直就是一座铅字的森林啊！我愕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随着车间主任的引领，穿过一排排排列有序的铅字架子，就像置身于一座奇妙的宫殿，待将整个车间转过一遍，我突然心生奇想，感觉这排字车间充满了奥秘——吸引着你用全身心去探寻，只要你有兴趣。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，让我喜欢上了这里，并与铅字产生了某种亲近感，排字车间特有的味道让人心旷神怡，连同紧邻的铸字车间，不断有机器声与烟火味传送过来，这种气息一直留存在我年轻时的记忆里。

我对铅字的熟知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，只是我当时还不了解《天津日报》的创办史，不知曾从《天津日报》走出去那么多新中国新闻史上的名人，特别是文艺副刊的创办者郭小川、方纪和孙犁。想当初，我们懵懵懂懂地进了新单位，身边的同事都统称为师傅，既有时代特征，也代表了一种尊重，正是因有这样的师傅们帮教，我们才逐渐形成了感知。

进入到排字车间后，我们这四个新学徒，统一由一位李姓师傅带领，在我的印象中，这位李师傅始终热情、和蔼，说话和气，从未跟我们发过脾气，不知道是不是车间领导跟他有过什么交代？他身量不高，干活时就系上围裙，戴上套袖，还要架一副白框眼镜，显得很有学问。是这样的，排字工人大都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之人，否则怎么能胜任印报、出版的工作呢！

李师傅给我们介绍车间情况，事无巨细、如数家珍，好像整个排字车间的情况，都装在他的脑子里。我们跟着这样的师傅学徒，感到心安和踏实。他特意领着我们站到铅字架子跟前，具体讲解排字工作的要求和要领，听着他的传授、亲身示范，我们特别感动。应该说，出了学校门，我们就踏进了报社门，也即迈向了人生与社会。我当时便恍惚地感到，李师傅就是我们入门的老师，四个小伙子每个人都比他高出一个头，围绕在他的身边，好像我们不是他的学徒，倒像是他听话的孩子一样。

初次站到铅字架子面前，我感到一头雾水，这一面墙似的铅字架子，有一人多高，上面的铅字是如何排序的，它们之间有没有规律，我们多长时间能够熟悉它们？李师傅看出我们面露难色，便指着铅字架子说道，你们不用紧张，车间里的这些铅字架子都是统一的，现在报纸上的文章正文，用的就是这种五号白体字，10.5磅（后来报纸多次改版，字号多有变化，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报纸容量）。还另有拼版时要用的标题字，也分字体和字号，与难检字一起在车间后面的架子上。现在，你们就尽快熟悉字盘里的字吧，争取能够早一天上岗排稿。

接下来，就看我们个人的努力了。每天一上班，我就站在铅字架子前“相面”，上下左右反复地看、念、记，恨不得只用一天时间，就把架子上铅字的位置全部记牢背熟。当然，光着急是不行的，要把心踏下来学。感觉到疲惫的时候，我就借着琢磨铅字架子解乏，发现这一个个铅字堆积起来很有分量，所以铅字架子都是呈A字形摆放，使之能够均匀受力，它们一排排整齐划一地伸向车间深处；每副铅字架子都是由十五个规整的方形木盒组成，上面六个，下面九个，中间是标点符号，有两寸宽的深出部分放置铅条及排字用的手托；木盒里排列有大小不一的竖格，铅字就根据字的标识装在里面；这样的铅字架子一列三组，

成若干趟，便于前后左右都能排字；除了常用字的铅字架子，还有黑体、楷体字等的字架子，以及用于制作标题的各种字号、字体的架子，如小初号、大初号、宋体、华文等，包括拼版时必用的种类繁多的铅条……每天上班八小时，我就在这铅字的海洋里遨游。

背了几天的铅字架子，基本记住了常用字的大概位置，这十五个字盘里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一个铅字，它们不是按照偏旁部首排列，也不是以汉语拼音为序，而是将使用频率高的字和词，放置在字架子的上方，伸手可及，这些常用字的字格也略大，用得多，里面装的字也就多，而不常用的字就相对少些，单独放在十六个字盘的右侧，是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。这样，就只能靠着死记硬背，才能记熟字架子上铅字的位置。我们几个人也会互相考问，看谁能记得更多、更熟练。虽然还不能指哪打哪，但磕磕绊绊地也能记得一些字时，我就在心里编几句话当稿子，试着去拣字，致使兴趣大增。

看到我们这样用功，有一天，李师傅告诉我们，你们可以试着排一排稿了，看看自己拣字的熟练程度、时间快慢。于是，我们学着师傅们的样子，像模像样地拿起手托，走向铅字架子。那时报纸的铅字排版都是按栏数划分，一块整版分为九栏宽，每栏十三个字，栏与栏之间有一个字的腰栏，所有预发稿件统一按两栏文发排，排版时再根据编辑版式变化栏数。有意思的是，仅有一页来的铅字上面，都有一个小凹槽，因为铸出的铅字都是反的，所以排字时只需对齐了这个凹槽，就不会出现歪字、倒字的情况。排稿前，这样的常识都是要知道的。我用左手握住手托，里面放上两栏宽的铅条，食指和中指夹着稿纸，腾出右手去拣字，一般都是看一眼稿，拣几个字，看多了怕记不住，还容易有误，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。师傅们可不这样，他们经验丰富，快手每小时可排三千多字，看稿和拣字几乎是同步进行，有的师傅甚至手里同时能捏四个单字，排字速度奇快。

初次展示身手，显得有些手忙脚乱，我举着手托、夹着稿纸，两只眼睛不够用的，一会儿低头看看稿子，一会儿又仰脸瞧瞧铅字架子，既怕看错稿、串了行，又怕拿错了铅字，遇到一时找不着的字，就在字盘前面来回寻找，心里一起急，就更是找不到要找的字，只好去请教师傅。一篇三百字的稿件，停停顿顿地排下来，根本无法计算时间，就当是一次练兵吧。

慢慢地，我终于能够独立排稿了，几乎每排一篇稿件，都需要仰脖弯腰、前后转身，但即使这样，仍免不了发生看花眼了、手托里排好的铅字乱了、往盘里掐活儿时铅字掉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再重新排过。就这样，经过反反复复无数次的练习、操作，李师傅才点头答应，让我们上岗顶班了。每天的预发稿很多，老也排不完似的，编辑部总是喜欢多发稿，长期停用的稿件也是有的。排稿多了，质量就成了关键，排好的稿子用墨滚儿打出小样，连同原稿一起送至校对组，排字车间的楼上就是校对组，在房顶开凿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孔洞，安装上一副升降滑轮，将打出的初校样装进小铁桶，上下传递起来非常便利。

稿子是排除来了，质量如何？在每份打出的小样上面，都印有排字者的姓氏，如果小样回来时变成“大花脸”，满是红笔画出来的差错，那是很丢面子的。庆幸的是，我的排字速度、差错率，从一开始就都是比较好的，老师傅们排版时，喜欢用这样的稿子，不需要怎么改错就可以直接排版。排字师傅们的认可，为我以后的工作赢得了赞誉。

#### (二)

排字车间的工作实行两班倒，白天要排预发稿和完成预排版，夜班主要是为了当天见报的版面，每天都在强调将出版时间往前赶，所以夜班师傅都是个顶个儿的好技术。1975年的冬天，车间通知我开始上夜班了，我像领到了新任务一样兴奋，这是仅仅熟悉排字工作的两个月之后。夜班是上夜班十二点整，单位里没有集体宿舍，我只好十一点半从家里骑车出来，一路夜幕。街道上寒风袭人，常有野猫、野狗突然蹿出，我从无惧色，更加快速地骑行。

我没有上夜班的经验，总是晚上睡一会儿就再起床上班。排字车间的夜班是实

打实的，待排稿、拼版工作完成，当天的几块版全部签完付印，我们还要分字，就是将排空的字架子重新填满，以备白班时使用，并将轧完纸型的铅字版拆散，标题字放回字盘里可以再用，正文用的五号字送回铸字车间回炉。此时，已经是凌晨了，天光大亮，在铅字架子之间来回穿行了一整宿，两条腿的腿肚子感到了酸胀，好在我那时年轻，并不觉得疲惫。我和师傅们结伴去对过院里的食堂吃早餐，那时铅作业每天有四角钱的营养补贴，照例是要喝一杯牛奶。我从单位回到家刚好八点钟，家人都去上班了，我正好睡觉。

转眼到了1976年。这一年，发生了一些国内大事件，这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年份——周总理、朱德委员长、毛主席先后病逝，人们的心情无比悲伤，新闻单位肩负着繁重的宣传报道任务，排字车间是出报的重中之重，又是极敏感的工作区域，不容有任何闪失。那一时期的排字车间，师傅们仿佛都置身于无尽的哀痛之中，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本职工作，避免出现任何纰漏。每当有重大新闻，车间里就会及时作出部署，师傅们都从白天就开始紧张工作，全力以赴。我记得清楚，每次头版的重大新闻，都是由公认技术最好的王、郑、冯等几位师傅轮流“主排”，大家均以他们为中心组版，协调有序。有一次，车间接到紧急任务，赶排一块转天见报的整版新闻，这块版需要制作通栏标题，肩题、主题、副题加起来多达

好几行，这类通栏标题的字号也大，厚度起码有多半尺，做题的难度很大。在操作台前，王姓师傅将通栏标题一丝不苟地调整好，试了试，一双手刚好能够抓起来，他稍加用力，就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便知道做好的标题已稳稳地装进了版心里，这一声重重的脆响，使大家悬着的心瞬间落了下来，关键时刻还是师傅，还要靠过硬的技术。

后来，我经常听人称呼王姓师傅为“万能”，这其中有多少含义我说不清，但仅就技术、认真和工作态度，我是认可这样的称呼的。我也慢慢看到了，这种铅字通栏标题，不同于锌版标题的制作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，多一根铅条都装不进去，少一根铅条便会在版里晃荡，还有可能错位或乱行。另有一位极细心的李姓师傅，每每签好付印的铅版在上轮转机前，他都要用特制的T字形钥匙锁紧版心，然后横竖吊线般地检查，就怕影响印刷质量。

如此高超的技术能力，着实令人羡慕。车间里的每个职工，都是党报的一名成员，报纸上的

事处吧。我即刻来到了行政办公楼，此时，整个院落里已经建起了若干排临建棚，我找到挂有人事处牌子的简易小房，推门进去，向一位老同志打招呼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老同志即人事处处长张启明，是一位资历很老的进京干部。他笑着对我说：好啊，小宋同志，你被调到文艺组工作了，现在就去那里报到吧。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有些木讷，又有些紧张，还有一些激动，但张启明同志那张和蔼的笑脸，却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我喜爱文学，尤爱诗歌，能够到报社文艺组工作，曾经是我的梦想。那天报到的时候，我见到了文艺组组长王干之，这位从报社编委岗位上离休的老编辑，已于2023年11月24日因病离世，享年97岁。我当年的那首诗歌，就是由他签发的吧。那天，他介绍了文艺组的情况，让我多读书、多向老同志学习。他还特别提到了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创办者孙犁，问我是否读过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。在当时，我是非常敬重这位组长的，看到他每日伏案看稿、改稿，有时也写随笔和诗歌。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儿童小说。我还知道他曾和孙犁一起工作过，同住在一处报社宿舍。很多年后，当我主持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工作时，每到春节都去看望他，还专门约请这位老主任，写过怀念孙犁的纪念文章。

这些都是后话。到文艺组报到后的当天下午，我回到了排字车间，向师傅们告别，从他们的眼神里，我看出了不舍和羡慕，我感谢这些曾经带过我的工人师傅，虽然仅有位师傅是专门负责带我的，但工作中有了问题，无论问到哪位师傅，他们都是毫无保留地传授，让我这个学徒如沐春风。随后，我走到那副自己经常排字的架子前，抚摸着整齐的字架子，浏览着字盘上已经相当熟悉的铅字，心里不禁升起留恋的情愫。在更衣室，我取下工作服，将套袖卷起来，关上了衣橱门。遗憾的是，我没有从车间取走一个手托、一只镊子、一把铅字尺。我想，我没有带走任何一件物品，是想把自己对这段生活的念想留在这里吧。

我进入报社排字车间的时间不长，既没有拜师，也就没有出师一说。后来才知晓，报社是想从我们这届学生中，继续培养自己的编辑记者，上一届招工之后，就选拔出几个表现突出的苗子调进了编辑部，我们这届仍然如此，先分到车间，是为了让我们熟悉报纸的整个印刷流程。可在当时，我哪里会知道报社领导的意图啊，只能无条件服从调动。

虽然调离了排字车间，但编辑工作却离不开排字工种，除了平日与排字师傅们打头碰面，排版时还是要去排字车间的。我当了文艺编辑后，就经常拿着画好版式的小黑板去拼版。在排字车间，我对师傅们自然会有一种亲切感，有些活儿我还帮着一起干：有的文章出现“顶头点”，我就抢着换成对开标点；改错时，我先到铅字架子上去拿好字，尽量不让师傅来回跑；版面排好了，我主动准备好墨滚儿和纸张打样……每次画版式时，我尤其认真仔细，在小样上精准计算，我知道如若字数计算不准，就会给师傅带来麻烦，还会耽误排版时间。铅字印刷时期的报纸，讲究合版，差一点儿都不行。当年，华北五报《天津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《河北日报》《山西日报》《内蒙古日报》定期举办报纸质量评比，其中有一项就是用尺子量报纸版面，有对不上行的情况便会减分。在后来改用计算机排版时，年轻的操作者不再顾忌什么的概念，想怎么走文就怎么走文，编辑也无需再提前画好版式，只需告知排版者一个大概就可以了。我对铅字的怀想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就只能借助于旧报纸所散发出的油墨香了。

我是忘不了的，过去、现在忘不了，将来也是不会忘记的。铅字带给我的是一种缘分，记得那么牢靠、那么清晰，那么有烟火味。在人生漫漫的长途中，有关铅字的记忆，已经像刻刀一般深深地印刻在了脑海里。那段短暂的生活，因为有那么多可敬的师傅们相伴，才让我有了至深的情感和记忆。排字师傅们对报纸印刷工作极其认真，有着较高的政治觉悟，不管是在岗期间，还是退休之后，他们对报社的情感依旧深厚。我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一员，现在，终于能有一篇文章，写出他们默默奉献的身影，为我们这张党报存档。

不久前，在报社退休群里，得悉又一位老排字师傅去世了，令人伤感。这位卢姓师傅曾任排字车间副主任，当过骑兵，他文化程度不高，工作却很认真，行止都是军人作风，雷厉风行。有一段时间，每天下班后都要政治学习，都是他组织大家念报纸、读文件，极是负责。像他一样的老排字师傅，都是对党报的新闻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，他们的相继离去，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，更是后辈心中永远的痛。

像铅字这样微小的物件，在我的工作中，实际只出现过短暂的一年多时间，今天能够重新回到眼前，确是一件幸事，别具意味。那是青春的时光、青春的年龄、青春的向往，它们在生命的记忆里，属于闪光的时段，哪怕仅是留有一点点记忆，都是无比珍贵的。人生中，毕竟流失得太多，像这样零散、细碎的回忆，如果不是偶然间被钩沉出来，恐怕真的就会遗忘掉了。如今，这些近五十年前的回忆，即便是有些模糊、误记，也仍然让我感到热血升腾，倘若能从中找到几组镜头，穿越回到那些画面里，无疑便是生命中最生动的色彩了。

2024年4月下旬改定

(题图照片为《天津日报》创刊60周年社史展上的铅字架子实物，但排列有变。)

#### 编辑附记

《我与铅字》是本报高级编辑宋曙光以近40年报纸副刊编辑生涯为背景，通过亲身经历描写报纸铅版印刷时期的见闻，更是以丰沛的情节、感人的文字，回顾了近50年前，《天津日报》铅版印刷工作的历史。作品中，作者对当年排字工种的追忆，对早期报纸铅版印刷细节的描述，对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缅怀，倾注了深切而质朴的情感。

近日，作者将原稿重新润色、补充，以《我与铅字》为题，交由本刊发表。这篇近万字的文章，以感恩之心、深情之笔，留住记忆中那段闪亮的过往，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缩影，保存下若干珍贵的工作场景与细节，记载了一代代天津日报人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的不凡贡献。

为此，本刊借发表《我与铅字》之际，向所有为党报工作付出过心血与汗水的前辈们致敬！